224.1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贵阳的老字号专辑

第36辑

贵阳市图书馆藏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贵阳的老字号》专辑

第三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月

EA30/105

主　　编　　章德华
编　　审　　朱崇演
　　袁伯康
　　张　垠
责任编辑　　张建军
　　卓建安

目　　录

永隆裕盐号述略……华树人（1）
恒丰裕字号的兴衰……杨维新（11）
傅恒镒油号……傅北萍（21）
赖兴隆商号……朱林祥（26）
福康颜料店……王　伦（31）
光裕典……胡先礼（36）
怡源字号……卓建安　何　涛（49）
恒兴酒厂与赖茅……韦　岭　傅斯甫（62）
贵阳的“省号”概况……黄　炜（67）

林家织布机房……王之幸（72）
刘义兴丝线店……刘道行（78）
胡长盛制革厂……吴浩祥（82）
张鹤龄笔墨庄……凤　枢（86）
一中烟厂的经营管理……骆守先（91）
永生橡胶厂的创业与发展……徐振邦　傅德芬（97）
西南橡胶厂的经营管理……卢逸尘（100）
许悦来商号……许邦华（105）
全泰永百货店……张公溥（109）
丁兴隆金号……陈廷缜（118）

宋华丰金号…… 朱林祥（124）
刘源春…… 傅心仪　胡知三（130）
思义堂国药店…… 王一民（133）
同济堂药店…… 胡华超（140）
协济药庄…… 吴　庸（147）
曾氏兄弟艺术社…… 谢怀珍　曾繁生（154）
阿嘛照像馆…… 彭晓珍（159）
南京拍卖行…… 张少正（163）
亨得利贵阳钟表眼镜行…… 厉永刚　邱松年（167）
上海时装公司…… 熊寿宁　王茂云（172）
新华利玻璃五金店…… 袁菊生（175）

雷家豆腐元子…… 雷善祥　雷国庆（179）
宋家糕粑稀饭…… 徐振邦（184）
苏肠旺…… 傅斯甫（187）
邓皮蛋、余豆豉颗…… 王蕴瑜（190）
陈永泰茨藜酒店…… 胡先礼（200）
阳永馨斋酱油…… 陈什夫（202）
弋鸿盛麻油店…… 弋良俊（206）
麦香村机制面条…… 王廷栋（212）
上海酱园…… 金恭铨（217）
贵阳的川味“四村”…… 白天白（222）
大三元酒家…… 张祖谋（227）
抗战时期的贵州大饭店…… 李桂铨（234）
编　后…… （23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永隆裕盐号述略

华树人

永隆裕乃黔边仁岸的盐号名称，系我的曾祖华联辉所创办。

华氏原籍为江西抚州临川县。清康熙年间，始祖以行医入黔，落籍于遵义，在团溪定居。以后改贩食盐为业，家道日丰。到了曾祖华联辉，除继续经营盐业外，又读书考试，为光绪乙亥（1875年）恩科举人。

贵州不产盐，食盐均仰给外省。邻近广西各县如荔波、黎平、榕江、罗斛（罗甸）等县，仰给于粤盐。邻近云南的盘江八属兴义、安龙、贞丰等县，则仰给滇盐。其它约五六十个县，均仰给川盐。川盐产于四川自流井，分几个口岸由水路输入贵州。

光绪二年（1876年），丁宝桢从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丁为贵州人，深知川盐运销之弊，到任不久，便决心改革盐政，“而未得要领”。由于同乡四川道员唐炯推荐，我曾祖华联辉应聘入丁督幕府，协助规划。据黎庶昌所撰《清坟特用四川知府华征君墓志铭》称：唐炯向丁宝桢说，“遵义华某者，其于盐务利害至精熟也。今公欲扫孔桑之豪桁，规刘晏之常平，将非其人不可。”华联辉到川后，丁与计事，大悦。又曰：“果奇才也，唐某诚知人”。“改运事，一倚君主办，君亦竭诚赞画，巨细躬亲”。

华针对过去“官督商运”的弊端，提出“官运商销，分岸定量，设立岸商，责其承销”的原则，经丁宝桢采纳后，订出改革盐政的措施，其大要是：在四川泸州设立“办理黔边盐务总局”，在生产盐的“灶井”处所设立“厂局”，各运销口岸则设立“岸局”。这是官运的机构。在运输程序上则是厂局直接向“井灶”将盐“籴入”，然后由厂局的“委员”将盐运到“岸局”，岸局最后把盐售与指定承销的盐商。商人获盐后运到何处，有其自由，政府不加干涉，只是在某些地方设卡进行稽察。每年销往滇黔两省的食盐定额，货色配搭和银两收支，均由总局统筹规定。此外，还设置“裕济仓”，以平抑盐价；设“大盈库”，接受各厂局的委托运输。又规定，应交政府的税，已纳入成本计算，不另征税。

至于“商销”办法，则分为四个口岸，由商人将盐贩运到黔。泸州盐务总局下，按各岸次序设立分局，办理运输业务。这四个口岸是：一为由四川纳溪上溯至永宁小河，长约200余里的“永岸”（永宁河线）。二为由四川合江上溯赤水河至贵州仁怀县茅台村，长约300余里的“仁岸”（赤水河线）。三为由四川江津沿綦江上溯至贵州松坎长600余里的“綦岸”（綦江线）。四为由四川涪州沿乌江上溯至龚滩（酉阳）小河长约800余里的“涪岸”（乌江线）。这四个口岸运输入黔的川盐，都由政府指定商人承销，含有专利性质。

先曾祖因熟悉盐业经营，在新办法颁布时，取得“仁岸”的销售任务，这在当时含有带头示范作用，也可能是丁宝桢对他个人的酬谢。仁岸获得贩卖专利的商家有四个字

号，即协兴隆、义盛隆、永隆裕和永发祥。前两个字号为陕西商人开设；后两个字号，都是华姓一家的资本。后来把永发祥并入永隆裕，由华家统一管理。

仁岸承销川盐的几家商号在赤水设有总店，在四川自流井设有分店，办理销售和纳税业务。

由四川合江至贵州茅台村水路约300余里，都是官运，沿途有盐防军督运。船到茅台村后将盐交与商人，商人再从茅台陆运到贵阳。永隆裕盐号的运销情况是在茅台、鸭溪、金钱（原属黔西）滥泥沟、遵义、团溪等地设置趸售站；刀把水镇则设转运站，经乌江渡、息烽、扎佐等地而达贵阳。沿途还有分站，均有专人管理。分站有铺面，交易大的铺面有十余间，还有仓库。每个站均有押运人员和背盐夫役，食宿的栈房。鸭溪、刀把水、团溪等站，房屋众多，设备齐全，交易频繁。

各岸运销川盐，按销区规定限额。限额以每人每天吃盐3钱计算，分配给各岸的销量也就不同。仁岸月销量为22“儧”每儧在自流井起运时为10万零8千斤。永隆裕与陕西盐商分摊，各销11“儧”，实数为118万8千斤。永隆裕分得的这个数额，由茅台村运到各站，在各站分别销售一些，大量的都运到贵州永隆裕总号销售。永隆裕总号设在现中华南路南段，左为学台衙门，对门为吉祥寺，旧名盐行街。这条街堆栈林立，坐商行贾云集，永隆裕是这里的第一个大字号，是贵阳食盐集散的枢纽。

各岸除销售量有定额外，批发价（趸价）和零售价，均由官运局根据产场出厂价和销场差额核定。承办商须依价出售，不得任意增减。

缴纳给政府的盐税，税率按包计算。每包重180斤；每50包为1“引”。纳税由官运局发给“盐引”（税票）。由于盐可在沿途销售，所以盐包的重量，各站有所区别。在合江，每包以180斤计算；运到茅台、鸭溪后，减为以132斤计算；再运到滥泥沟，刀把水，减为124斤；到贵阳后每包已减至96斤计算；贵阳纳税时，每包更减至以84斤计算。这种每包重量沿站递减的办法，主要是扣除了由上一站到下一站的损耗和商家所付的运费。

从合江到茅台虽是水运，但滩多浪急，而且是溯流而上，耗费可观。光绪四年（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发起整治赤水河，采用“商办商捐”的筹款办法，由“官督民办”。派曾寿庄、罗乐九、张广文、罗幸耜四人督办仁岸这一段河流，即合江至茅台村段，把治河重点放在马桑坪至茅台的40个险滩上，有选择地整治了35处，历时3年，耗银2万余两，由陕西帮与华姓永隆裕盐号，各负担一半。

经过治河，虽然四川合江至茅台村的水路运输较前方便，但茅台以上的盐运，由于山高路险，运盐均是人背马驮。从茅台起程到贵阳，人背的要占运输总量的50％以上。背，是把盐装在直立的竹篓中，竹篓口大底平，可装盐50余斤，多者可达80斤。日行40里左右。所经之处，多是山间道路，弯曲上下，十分辛苦。背累了要休息，只能将这竹制的背架，放在一种月牙形的独脚拐子座上，并且要反手将背架稳住，以防倾斜，使两腿轻松一点，站着歇气。这些背夫结队而行，有人监护，不能掉队。到站后由他人扶着将背架放下，才算得到休息，而所获代价却很微薄。永隆裕盐号沿途设有栈房供押运人员和背夫休息，食宿都较方便，条件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他盐号为好。

盐号中下级职员，如各站启纳、推销、押运人员，月薪纹银数两，经理可多一些。一日三餐，由盐号免费供应，并免费供给家庭住房，子女上学也有补助。由于这样，职工生活较为安定，工作也较安心。茅台盐号负责人有两位人称为徐大公和许大公的（忘其名），威信显著，沿途许多站的管理人员都由他们推荐。

后来盐的重量不用“包”计算，改用“担”计算，每担为100 市斤。从茅台到贵阳几百里地方，沿途从事运盐的每日数百人乃至千人，还有专业运盐的马队，有驮马3、4 百匹之多。川盐运输，因采取沿途设店销售的办法。形成了3 日一小场，10日一大场的集市贸易。除农民购用食盐外，还有许多到各处零售的小盐贩。总计永隆裕盐号每月盐的销量在百万斤以上。

永隆裕所售得的银钱，除照规定每季度按定额解交自流井官运局外，各站收益，除去开支，均换成纹银交纳到贵阳总号。市场交易所得的钱，有散碎银两和铜钱，铜钱要换成银两，零碎银两要铸成银锭，然后装箱运到贵阳。这也全靠人挑马驮。为了防止抢劫，还要请官办的盐防军护送。永隆裕解交自流井官运局和运到贵阳总号的银两，每次都在纹银万两以上。除招待护送军队的食宿外，另送保运费。每银万两交保运费二、三百两，较后来银行和银庄的汇费高出很多。

永隆裕盐号，先曾祖于光绪初年创业，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病逝时已积资十数万。他病逝后，叔曾祖华健庵，辅助先祖华之鸿（延厘）继续经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先祖辞去仁怀县训导，专心经营盐号，业务更为

兴旺。每年端午、中秋、腊月底三个关期缴纳盐税时，银两少则数十挑，多则百挑，先后绵延数里。“华百万”之名，传遍川黔两省。到辛亥革命前夕，永隆裕积资已在百万两以上。田产、房屋还不在计算之内。

从民国初年起，永隆裕光景渐不如前，以后天灾、人祸，纷至沓来。永隆裕盐号改名鼎升恒，一面收缩业务，节省开支；一面仍积极开拓，改进营业方式，变被动等人上门为主动招引顾客。凡在贵阳有信用的商家，特别是饮食业、酱菜业，均与之约定，发给盐号摺子，进行赊销，三、五担盐，随用户支取，不付现款。办法是将账记在摺子上，或分月结帐，或分季结账，月结者较季结者条件更加优惠。这种新的营业方式，方便用户，使之便于周转，也增加了盐号销售额。但是，总的情形是入不敷出，只能勉强支撑一时。

1937年抗战开始后，两淮盐务局随南京国民政府先迁重庆，后迁贵阳，西南各省盐务，统一由该局管理。为增加盐税收入，该局将川盐销黔定额增加，仁岸销额由原来的22镭增到26镭。实际最多只能销到18镭，其余规定应销的8镭，只能积压仓中，成为呆货。鼎升恒盐号，因亏蚀过大，被迫于1941年歇业。

富冠黔省的永隆裕盐号，从光绪初年以专营业起家到本世纪30年代歇业，大约经历了70年的时间。它是自贵州从明初建省500多年来，规模最大，资金最多，影响也很大的商号。这样一家大商号，之所以几经努力而终于落得歇业的结局，是由以下一些历史条件和政局的影响造成的：

一、辛亥革命后，贵州陷入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政局变幻不定，永隆裕遭到的损失很大。贵州辛亥革命成功后成

立贵州大汉军政府，先祖华之鸿被推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不久，滇军入黔盘据贵阳，强行向地方绅士商人“筹借”军饷，滇军头目公开恐吓说：“军队开拔在即，如果没有钱，社会治安恐怕难以维持”。甚至说：“如果商会不给钱，军队就要‘扯红旗’了”。所谓“扯红旗”，就是放火烧城。滇军眼睛首先瞄准的是永隆裕，是先祖华之鸿。在这种情况下，先祖不得不先把永隆裕的存银拿出来，盐号存银不够，又将家中存银抬走才算了事。我记得先祖卧室床前有两个装银子的平柜，听母亲说，柜中存有约6万多银元，在一夜之间，全被派来的挑夫挑走一空。

二、1915年，先祖华之鸿计划创办造纸厂，投入60万银元。最初投入的5万银元，要经湖南送到上海，当时无汽车无可靠银行或钱庄汇兑，只有用人挑运。因此，请督军刘显世派兵保送。刘见这样多银元，贪心顿起，便以“借用”为名，将银抬去不还，实际是公开掠劫。

三、民国初年，唐继尧入据贵阳，自封都督。任命先祖为政务厅财政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理。这不是重先祖之才，而是因为他是贵州首富，永隆裕盐号的大老板，可以在财政上支持他。贵州银行奉命发行银元票300万元。唐继尧的都督府政府一钱莫名，银行没有什么准备金，人们都只认定先祖是银行总理，有华家盐号作后台，在这种情况下，才接受下来干的。许多本地人说：“华四先生做官是奉命贴钱”。

四、民九以后，贵州政局更迭频繁。每届用武力更换政府，无论是叫省长公署的，或是叫省政府的，都要印行大量印刷品，照例都由文通书局承印。文通书局是当时贵州乃至西南三省设备最齐全的新式印刷所，由先祖从永隆裕存银

拨出一部分创办的。从1920年到1935年，大概换了七届政府，每届政府都欠文通书局印刷费货款少则万元，多则数万元，从不偿还，也不知找谁偿还。一届政府上台，既不承担上届政府债务，而且援例向文通书局赊账，印制政府机关大量印刷品，文通书局因此10余年来一直亏空，不仅无法填还盐号拨款，而是继续消耗盐号储存的银元。

五、文通书局创始于1898年，在日本购置整套新式印刷设备，选派学徒到日本学习技术，聘请日本技师到黔工作，所有费用，主要都取自永隆裕盐号，先后投入10余万银元。从文通的创办费用和以后对文通亏空的补贴，至少在20万元以上，这笔钱实际也是盐号的。

六、先祖创办的永丰抄纸厂（今贵阳造纸厂的前身为黔元造纸厂，黔元造纸厂前身即永丰），耗资达60万银元。这笔钱也是从盐号存银支付的。贵阳当时没有发电厂，没有公路、铁路，永丰纸厂的机器，除一段水路用船运外，陆运全是人力抬运。此外，作为造纸原料的稻草，当时也靠零星收购，原料来源无保证，生产时常停顿，产品因交通不便无法外运，贵阳市场太小，机器生产的纸张，多被积压。耗资60万银元，创办这个纸厂，是有极大盲目性的。1926年，周西成从赤水到贵阳任贵州省长不久，他看上永丰纸厂地点及整个工厂设备等，硬由贵州省政府强迫收买，利用其厂房机器及动力设备，改建为兵工厂，议定收购价50万元，分期付给，实际只付了10万元。并厂不久，厂房遭到火灾，重要设备悉遭焚毁。以后，毛光翔接任省主席，我父亲根据和政府所订合同，要求发还该厂。毛光翔政府虽然归还，但接受到手的只是个火烧后残缺不全的旧工厂。盐号投入的60万银元，

竟无一元利润收入，彻底赔光了。

以上几件事实，是盐号由盛而衰的具体原因。还有一项很大的耗费是修建大觉经舍。民九事变后，先祖为了表明决心，退出政坛，遂一心皈依佛教。先在朱家塘（小堰塘坝）建大觉经舍，供佛斋僧。1924年进一步在东城靠莲花池地段，扩建大觉经舍。中心建筑为5层佛阁，高30余公尺，加上前面的藏经楼，左右两厢僧房等，构成一完整古建筑（今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耗资达30万银元。建筑费用包括佛堂设备等费用，都从盐号拨给。此外，如文通书局被火灾后的修复和新添设备资金，也是由盐号支付。

应该提到的，是我祖父从清末起，对贵州教育事业的赞助。他和唐尔镛、任可澄共同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宪群法政学校、宪群师范、南明中学等，所有经费，有清楚记录的达8万余元，其中先祖个人捐助的不下3万元。

从以上几项粗略的统计看：纸厂投入60万元，建立文通书局先后投入20万元，修建大觉经舍30万元，已超过百万元。加入历届政府欠款，军阀掠夺以及对学校的赞助等，也不下20万元。这些钱，基本上都是从永隆裕盐号所积累的存银中支付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永隆裕凭借其贩盐专卖特权而致富，我祖父将盈余之钱捐赠学校和公益事业外，就是用于创办书局、印刷厂和纸厂、酒厂的投资，致力振兴贵州的文化教育，对新文化在贵州的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贵州民族工商企业的发展，对茅台酒的生产和打入国内外市场，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历史上，应该说是有眼光，有魄力，有过贡献的。但他缺乏现代投资家和企

业家科学运用利润的观点。永隆裕不是从盐号利润中，以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而是倾囊相助，很少留下再生产资金，这是它非失败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恒丰裕字号的兴衰

杨维新

恒丰裕是帅灿章于1921年在安顺开设的一家老字号。起初用益生昌名义经营花边栏杆、绫绸、布匹业务，1926年改组取名恒丰裕，由帅灿章任总经理，戴子儒任副总经理。总号设于安顺。先后在贵阳、昆明、重庆、汉口、上海、香港、广州、梧州、南宁、长沙、常德、邵阳等地设立分号，资金总额曾达黄金5万两，是安顺的四大商号之一。随着社会变迁，经营业务曾多次调整，经受过多次挫折。1939年又再次改组，更名为泰丰字号。帅灿章与戴子儒精诚合作，始终如一，一直保持到1949年贵阳解放为止，长达20余年。他们合作期间，曾经多次做过发展金融事业、促进进出口贸易、大展宏图的美梦。但既遭日寇侵华战争的重大损失，又受国民党反动统治敲诈勒索和货币贬值的劫难，备受“三座大山”的摧残和压迫，已气息奄奄，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土崩瓦解，泰丰字号亦随之结束。

一、恒丰裕时期的业务经营活动

1919年贵州军阀刘显世，为了扩张实力，招兵买马，乃开放贵州烟禁。号召全省遍种鸦片，巧立名目 征收禁烟特捐，至1921年烟产量达4、5百万担。征收禁烟特捐，年达4、5

百万元。安顺是贵州鸦片最大的集散市场，黔西南各县所产鸦片都聚集安顺。川、湘、鄂、粤、桂各省鸦片运销商多集中于此，设庄收购，加工整理，运往外省销售，市场异常繁荣。恒丰裕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恒丰裕改组之初，仅有资金6万元，以日用百货和栏杆丝绸、布匹为主，棉纱、呢绒次之，也兼做鸦片和存放汇兑业务。随着安顺鸦片市场的发展，逐步把业务中心转移到鸦片和汇兑金融业务上来。并以存放汇兑业务为契机，逐步推动鸦片业务的发展。又以鸦片业务的发展，扩大充实金融汇兑业务。相互调剂、补充，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

安顺鸦片市场的繁荣，促进了安顺金融市场的发展。但安顺除中国银行和贵州银行外，当时尚无其他银行。而贵州银行在省外未设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业务也不适应鸦片市场的发展需要，省外采购鸦片汇款均不通过银行汇兑，而由安顺四大字号（恒兴怡、公合长、恒丰裕、天福公）所垄断。四大字号均经营鸦片业务，同时兼营汇兑业务。这种汇兑业务，银行也无法与之竞争。因为这种汇兑方式，是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和比期对交的办法进行的。

所谓迂回曲折的方式是，通过重庆、武汉、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转汇到安顺，而不是由采购地点将款直接汇到安顺。所谓比期对交，是指汇款的时间，是按比期（每月两个比期：一是月中15日，一是月底30或31日）在汇款地点和收款地点同时收交。

所谓银行无法与四大字号进行竞争。是因为向银行汇款要交付汇费，而向四大号汇款，不但不付汇费，反而要倒收汇费，通过银行汇款，必须在汇款地点交足汇款，然后才能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